寻找“卓玛”

西藏女性背后的70年

□ 新华社记者 罗布次仁 王沁鸥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一首广为流传的《卓玛》,唱出了对藏族女性美好形象与品质的赞颂。在西藏,女性常被称为“卓玛”,也常被取名为“卓玛”,“她”的形象早已在祖国大江南北深入人心。

但在这个符号中,谁是“卓玛”?“卓玛”是什么模样?塑造她们的,又是怎样的力量?

翻开历史,踏遍雪域,我们寻找“卓玛”,也聆听“卓玛”背后的西藏故事和时代变迁。

当“卓玛”走出牛棚

德庆卓玛今年65岁了,她母亲的名字里也有“卓玛”两个字。

在西藏传统文化里,“卓玛”代表了女神的形象。德庆卓玛猜想,或许家里的长辈,希望孩子能受到“卓玛”的保佑。

只不过,命运一开始并没有眷顾她们。母女俩都出生在牛棚里,并且一出生就是贵族庄园里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

1959年之前,西藏仍实行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德庆卓玛和母亲便是原克松“谿卡”(“庄园”)的农奴,这是当时噶厦政府噶伦一索康·旺青格勒在山南的六个庄园之一。302名农奴每天承受着沉重的差役、劳动,换来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毒打。

那时的德庆卓玛,骨瘦如柴,头发凌乱,只配住在牛棚里,晚上常常就睡在牛蹄边上。

1959年3月,命运的转折来临。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打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

草原、雪山……“卓玛”的家乡从此走进了光明的新时代。

德庆卓玛也终于走出牛棚,她的家乡——现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当年率先进行民主改革,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

“不住在牛棚里了,牛棚里的牛还分给了我家一头。”德庆卓玛说,那时,她的妈妈不敢相信,自己和女儿竟然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

社会制度的变革,带给妇女以及所有在旧西藏处于下等等级的群体真正的解放和平等。曾经,《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旧西藏法典规定,妇女属于“下等下级人”,其“命价”为一根草绳。

1959年,这些法典均被废止。

后来,德庆卓玛上了村里开设的小学。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她家也和村里许多其他人家一样买了拖拉机。农忙时节,社区还会无偿给群众提供农机具,解决群众春播秋收问题。

于是,牛用不上了。围着农田和牛棚打转了大半辈子的德庆卓玛,过上了新的生活。

现在,她的3个女儿都在距她家近15分钟车程的山南市区工作,其中大女儿和女婿做起了运输生意。克松农业机械化率已达98%,不少农民不再需要一年到头守着土地,就近务工经商成为时尚。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克松投资近4000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康示范点”建设,整修排水、照明、绿化系统,修建便民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2017年,克松社区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2020年,社区人均年收入达到2.5万元。

德庆卓玛说,她是家族里第4代出生在牛棚里的孩子。

“孩子们不会再这样了。”她说。

当“卓玛”见证发展

民主改革之后10年,一个叫卓玛的女孩在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出生。现在,她是西藏气象领域里的顶尖专家。

又过了10多年,一个叫斯朗卓玛的女孩降生在藏东山谷中的昌都。后来,她成为西藏第一代铁路人。

一个望向天空,一个脚踏大地,是什么让山里的“卓玛”走到了高原发展的最前沿?

1986年,卓玛考入被誉为“中国气象人才摇篮”的原南京气象学院。“当时,学院连续招收了几届民族班,这是国家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专业人才。我们那几届学生,现在都是西藏气象界的骨干了。”她说。

毕业后,卓玛被分配到定日县气象局锻炼,那是距离珠峰最近的气象站。无论风霜雨雪,站里的观测员都要定时观测数据并发报,精确到秒。凌晨时分,在寒冷的珠峰脚下,卓玛看着在站里坚守了十几年的老前辈趴在地上,一个刻度一个刻度读着数据,忽然间明白了气象工作者承担的责任。

“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牧民的收成和人身安危,一分一毫不能出错。”卓玛说。

而让斯朗卓玛明白责任之重的,是2006年她在站台上迎接第一列进藏火车开进拉萨的一刻。

今年40岁的斯朗卓玛记得,她小时候上小学,先要翻山越岭徒步3天,再站在卡车车斗里颠簸1天,才能从村里到达县城。后来,她考上内地西藏班,还要再坐车、坐船,经过十天半个月才能到达初中所在地湖南岳阳。

尽管求学之路艰辛,但斯朗卓玛说:“没有去内地上学,就没有我的今天。”

20世纪80年代,根据西藏人才奇缺、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国家做出在内地举办西藏班(校)的决策。1985年9月,以藏族为主体的首批西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学习,开启了西藏教育新模式。

在湖南上学的4年里,斯朗卓玛因为山高路远,没回过一次家。加上村里那时不通信号,以致父母一度以为,“女儿出去上学给上丢了。”

回忆往事,她感到既好笑又心酸。

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开工建设时,斯朗卓玛正在读高中,她听说西南交通大学要招一批西藏学生,为青藏铁路培养人才,就毫不犹豫填了志愿。

虽然要继续远离家乡,但她抱定决心:“毕业的时候,我想见证火车开到家乡。”

青藏铁路通车至今,斯朗卓玛一直在拉萨火车站工作。车站周围在她刚来时是一片农田,现在已发展成为拉萨高新技术开发区。

目前,西藏铁路运营里程达954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破11.7万公里,全区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达到95%和75%。

每年,斯朗卓玛在车站迎接八方来客,也会送走一批特殊的旅客——前往内地求学的学生。许多学校都与客运站开展合作,为学生统一购票、送车。

“真羡慕现在的他们!”斯朗卓玛感慨万千,“但看着他们去远方,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两位卓玛,是西藏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缩影。

在旧西藏,“勿予妇女议论国事之权”是写入法典的律条。如今,西藏有了女法官、女律师、女飞行员等,女性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33.3%。

西藏女性已真正撑起了“半边天”。

“我常常会想起母亲为我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站在显示卫星云图的屏幕前,已是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气候中心气候监测与评估室首席专家的卓玛说,母亲希望叫“卓玛”的女孩要善良勇敢,即使个人力量微小,也要尽力助人。

这些年,卓玛参与气象资源普查、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等重大项目,让气象事业进步成果惠及高原科学研究、经济生产和千万家庭。

“30年了,我想,我通过自己的工作,正实现着母亲的期望。”卓玛说。

当“卓玛”望向未来

“90后”姑娘洛桑卓玛决定从事模特行业的时候,母亲与她大吵了一架。

她大学学的是法律,去台上走“猫步”,在母亲眼里有些不务正业。

而13岁的牧区姑娘多吉卓玛刚开始踢足球时,父母也告诉她:“女孩子要有女孩子样。”

“卓玛”的梦想,要坚持吗?

洛桑卓玛说,她从小热爱模特这个行业。去陕西读大学时,她自作主张报名模特培训,连学费都是借的;毕业后靠走秀、代课,自己还上了钱。2011年,她参加第25届世界超级小姐大赛,一举获得中国区总决赛第4名。

2016年,她在家乡拉萨创立了一家少儿模特和美育培训机构。

在没人尝试过的领域创业,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洛桑卓玛一开始担心家长群体不接受模特这个行业,后来又面临师资不足的挑战。带学生参加比赛前,她常常整夜整夜地熬,确认妆发、服装等细节。有学生上场前在后台哭,她把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你好好想一想,你想不想走到台上?”

“我很看重孩子的独立和自信。”洛桑卓玛说,自己很幸运,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她希望她的学生们也可以找到这份热情。

哪怕是想尝试在大多数人眼里不属于你的领域,也可以。

在海拔4300多米的当雄草原上,多吉卓玛正坐在自家的牛群间出神。她喜欢足球,但父母并不怎么支持。

她只有一双很硬的靴子,放牛和踢球时都穿它,在足球兴趣小组,教练还提醒她说,穿这样的鞋运动容易受伤。

学校老师很支持多吉卓玛。她就读的拉萨市当雄县龙仁乡中心小学开设了足球、篮球、旱冰、舞蹈等多个兴趣小组,还正在筹建女足队。校长巴桑次仁说,他希望孩子们能全面发展,至少培养一项爱好。“这样,他们不仅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也能更快乐地生活。”

建在牧场上的乡级小学,音乐、美术、计算机等专业教室一应俱全,这在西藏已成为趋势。“十三五”时期,西藏教育音体美课程教师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学数理化生课程教学计划完成率达100%,中学理化生实验课程开出率100%。10年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西藏已累计投入1656.89亿元,年均增幅17.96%。

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也鼓励着年轻人勇敢追梦。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西藏市场主体已达到36.5万户,5年间增长1.3倍,创业潮方兴未艾;从2012年至今,西藏已有超过4000名大学生在内地实现就业,传统的西藏毕业生就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洛桑卓玛接到很多学生家长发来信息说,孩子接受基础的模特训练后,变得敢于表达观点和展示自己了。

她自己后来也发现,母亲把她的获奖证书放在了家里的显著位置。

她的工作塑造美、传播美,但在她心里,美没有单一标准,美是包容与尊重,是对自己的认可。

“我的名字是‘卓玛’,这代表了一种有能量的女性。”洛桑卓玛说,“希望我也能让更多年轻人拥有追梦的勇气。”

在北方的牧场上,龙仁乡中心小学一年一度的足球联赛要开始了,多吉卓玛准备出发,妈妈走上前来笑了笑,递给她一双崭新的球鞋。

球场上刮起了风,吹得人脸有些生疼,但球场边的观众席早已被占满。穿上新球鞋,多吉卓玛叫上女生伙伴,加入了男孩的队伍。

这是学校的特别规定,七人制的比赛中,每个队至少要有2名女队员。她们和他们,一起奔跑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女孩的热爱,被小心呵护和鼓励着。

“卓玛,卓玛,向前跑啊!”观众们呐喊着。

新华社拉萨4月13日电

日本百余万吨核废水将排放入海

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 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

法 环球观察

□ 本报驻日本记者 冀勇

4月13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含有对海洋环境等有害的核废水。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决定实施后,不仅是太平洋的巨大灾难,且核废水会随着洋流污染各大海洋,到时,全世界都将为这一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

核废水2022年排放入海

13日上午,日本政府相关阁僚会议最终确定了把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尽管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存在很多质疑声,但日本政府声称排放决定是“3·11”地震灾区复兴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一意孤行的决定看似给这一年多的纷争画上句号,但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后,东京电力公司将在获得核能规制委员会许可后开启核废水排放。因为还有排放设备调配和排放设施施工等问题,预计两年后正式开启排放。

决定排入大海的核废水共有约125万吨(截至3月的数据),存放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内1061多个储存罐内。这些核废水主要是福岛核电站2011年发生事故后,在善后处理中向融毁的核反应堆内注水降温产生的高浓度污染水,以及流经核电站的地下水、雨水等,经过多核素净化设备清除部分放射性物质后产生的核废水。因为相关作业仍在继续,目前福岛核电站每天产生约140吨核废水。

关于把核废水排入大海,东京电力给出的理由是核废水的存储能力将在明年秋达到上限,在此之前必须采取办法处理存储的核废水,而排入大海是“唯一选择”。这一理由被日本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指责。与此同时,人们担忧核废水将给海洋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极为恶劣且无法挽回的影响。

制造舆论为排海找借口

虽然东京电力称排入大海的核废水已经经过净化处理“放射性物质含量极低”,但国际上多个研究机构指出,经过多核素净化设备处理的核废水中含有大量氚和其他放射性元素。因为氚的半衰期很长,核废水排入大海后,将长时间对海洋生态环境和鱼类等生物造成污染。

此外,因福岛核电站废弃作业预计将花费30多年时间,未来还将不断有核废水产生,日积月累排入大海的核废水总量将非常惊人。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内专家研究显示,如果日本将核废水排入大海,220天之后,被污染的海水就会抵达韩国济州岛,400天后则会抵达韩国西海岸,韩国周围海洋生态环境将可能遭受破坏。

对日本政府决定把核废水排入大海,日本国内渔业团体纷纷表示反对。

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岸宏在与首相菅义伟会谈时表示,“坚决反对”把核废水排入大海,认为将损害日本渔业形象。日本宫城县渔业协会会长寺泽春彦说,“把核废水排入大海将给宫城县水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12日,日本市民团体到首相官邸前抗议,要求政府采取负责任做法,撤销决定。环境保护团体日本地球之友等多个市民团体向经济产业省提交了包括日本在内88个国家和地区的、有6万多人参加的反对排放签名。在提交签名后的记者会上,市民团体成员指出处理水含有氚等放射性物质,排放入海将破坏海洋环境。

关于日本政府采取将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处理方式,国际社会也有很多质疑声。2016年6月,日本政府专家会议提出包括排入大海、地下掩埋、蒸发排入大气等5种处理核废水的方式,可以说各种处理办法中不乏兼顾环境影响的方案,但排入大海显然是最方便且成本最低的办法。2019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张排入大海是唯一方案,并不断制造舆论,但这一方案时至今日显然没有获得国内外的支持。

引发国际社会普遍担忧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这一决定普遍感到担忧,是因为核废水排放入海计划的长期影响尚难以评估,一旦造成严重后果,将难以挽回。

此外,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在福岛核事故处理方面有过多次不诚实记录。仅在核废水处理方面,东电公司曾声称自2011年6月后福岛第一核电站没有新的放射性污水排入海洋,但后来又改口承认有受污染的地下水流入海洋。

对于日方行径,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发表声明指出,将核废水排放入海会提高危害孩子们未来健康的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2日在会见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时,就日本政府拟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有害废水排海一事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注意到各方对此事的关切,理解此事正受到全球关注,愿以公正、客观、科学的方式积极推进机构对此的评估和监督工作。在此过程中,愿与各利益攸关方加强沟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13日就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发表谈话,指出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

韩国政府4月13日在国务调整室室长具润哲的主持下,紧急召开有关部门副部级会议。具润哲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将向日方转达反对此次决定的民意,并要求日方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韩国公民安全和保障海洋环境不受污染。与此同时,韩方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转达韩方对此事深感忧虑的立场,并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方处理核废水进行科学验证。

法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我国野生鸟类资源实现不断恢复

本报北京4月13日讯 记者**侯建斌** 记者今天从全国“爱鸟周”40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我国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持续开展监督检查,以及发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加强巡查巡护等一系列措施,使我国野生鸟类得到有效保护,朱鹮、白鹤、黑鹤、中华秋沙鸭、大鸨等野生鸟类资源实现不断恢复和发展。

我国现有鸟类1445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394种。在全球的9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有4条贯穿我国全境,90%左右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鸻鹬类途经我国东部沿海,几乎所有中亚迁徙路线和西亚-东非迁徙路线上的水鸟都会经停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原湖泊。

4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鸟类保护力度,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到5000多只,白鹤由210只增长到4500余只,黑脸琵鹭由1000只增长到4000余只。截至2020年,我国环志鸟类总数达845种392万只,彩色标记鸟类达278种12万只,利用卫星跟踪技术掌握了中华秋沙鸭、白鹤、大鸨等60余种鸟类的迁徙规律,为科学开展野生鸟类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春季是鸟类繁衍的关键时期,是候鸟大规模迁徙和集群活动的主要季节,也是加强候鸟保护的重点时段。为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关于加强春季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确保候鸟迁徙和繁衍安全。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在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保护体系建设、强化执法监管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升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水平。

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历史的抉择

上接第一版

会议形成了12000多字的总决议,总结了失败教训,通过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写下了“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评价遵义会议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四项决定 历史抉择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十多把椅子整齐地围绕着中心的长桌,而86年前的那场会议上,有方凳有长凳。据史料记载,腹部受伤的王稼祥躺在藤椅上参会,聂荣臻因脚伤每天坐担架到会。

据讲解员介绍,当时的参会者“先来先坐”,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27平方米空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始转变。

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会场气氛的焦灼。“A同志”是李德,他被批判和博古一起走了左倾军事错误路线。

《红军长征史》这样描述李德的状况:“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在根据史实还原的“遵义会议3D情景展”中,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也在叹气、低头中度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听完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后,博古叹气侧身,即使最后会议达成一致意见,他也没鼓掌表态。

长征前毛泽东虽已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始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保持着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走来,他不断争取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努力挣脱“左”倾冒险主义的枷锁。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等为前奏,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精准预判和卓越才能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红军上下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信任。

不少学者研究遵义会议这段史实时均发现,当时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贵州黄平曾有一段“橘园对谈”。王稼祥问:“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再这么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答:“我考虑再三,他们再来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作为“三人团”的一员,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不少当时的与会者在回忆录中将张闻天的报告称为“反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

耿飚曾回忆说:“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人敢提呀。”耿飚提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

这次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项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不久后,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日记中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名重要亲历者对会议的如实评价。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到‘遵义会址’,通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重温那段艰辛的历史时刻,体会那种坚毅的信念担当。每次参观、学习都是一次心灵的荡涤,成为激励我们更好履职,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动力源泉。”遵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刘秀林说。

“我计算过,红军长征一天至少要走40公里,相当于每天走6万多步,而且都是在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走完的,没有非凡的信念支撑,难以想象。”来自遵义红花岗区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已经讲了7年红色故事,她的书房里珍藏着她的爷爷——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生平照片。

“我通过整理爷爷的故事了解了整个长征,再把这些故事带到学校,讲给孩子们。”孔霞说,她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和传播遵义会议和长征的故事。

台前公安找出难点拔除痛点提升履职能力

□ 本报记者 马维博

□ 本报通讯员 刘合敏

前不久,河南省台前县河南鹏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下称鹏达公司)的一份报案笔录摆在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张建国的案头。

原来,鹏达公司在2020年9月4日与上海市某贸易公司及某股份有限公司顾某作为担保方签订30吨羽绒采购协议。按照约定,上海某贸易公司向鹏达公司预定羽绒30吨,每次发货预付30%货款。之后,鹏达公司向指定地点发货共计30吨,货款总价值863.14万元,但上海某贸易公司及顾某在支付256.1万元预付款后以各种理由推托拒不履行剩余款项。

在张建国看来,优化营商环境将是公安机关教育整顿工作的一个落脚点,而借办理这起案件打响县域公安系统服务营商环境的“第一枪”,尤为重要。

在张建国指挥下,该局经侦大队精干警力30日内横跨5省,多方取证,帮助鹏达公司挽回损失230余万元。

据了解,公安机关教育整顿工作启动后,台前县公安局就分别召开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学习教育环节动员部署会和警示教育大会,主动对标上级党委政法委和公安机关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教育整顿工作,第一时间成立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抽调专门人员成立了综合协调、学习教育、新闻宣传、督察检查、干部人事、后勤保障6个工作职能组,分工负责、协作配合。制定下发教育整顿实施方案,配套出台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重点工作责任清单,明确责任单位、办结时限,实施挂图作战、限期销号。

与此同时,台前县公安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针对户政、出入境、车驾管、交通违法处理等部门和群众打交道多、群众感受教育整顿效果明显的特点,将窗口单位作为工作重点,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教育整顿工作带来的丰硕成果。该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杨松洁说,要求干警自觉将办实事意识贯穿到日常警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数据显示,截至公安机关教育整顿工作第一阶段验收,该局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21人,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1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39件。该县刑事“零警情”达26天。

“找出难点、拔除痛点、解决燃点,让教育整顿工作在警务实战中变得更加生动,避免高开低走。”张建国说,台前县将以教育整顿为契机,把成果转化为推进重点业务工作的不竭动力,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牢记为民初心,继续擦亮底色,全面提高公安队伍的忠诚履职能力和业务技能水平,提升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水平。